

## 《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中东欧卷》出版 座谈会纪要

李仲云

由南京大学钱林森先生和厦门大学周宁先生主编的《中外文学交流史》自2005年启动以来，经过国内外几十位作者的十年潜心研究和编撰，最终由山东教育出版社以皇皇17大卷的规模呈现于学术界和读书界。这是继20世纪八九十年代北京大学与南京大学合作出版的《中国文学在国外丛书》（10卷，乐黛云主编，钱林森副主编，花城出版社）、20世纪初问世的《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10卷，钱林森主编，宁夏人民出版社）之后，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领域又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本丛书2015年底出版后，受到广泛关注，并通过在印度新德里世界书展、第23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第23届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高迪亚姆斯”国际图书与教育展上的发布活动不断扩大影响。山东教育出版社首推《中国-印度卷》成功后，陆续与韩国、埃及、罗马尼亚、越南等国多家重要出版社分别签署版权输出协议，在中国学术成果的国际化出版方面创造佳绩，同时让文学交流史的研究成果回馈中外文学和文化交流本身。

作为丛书收官之笔的《中国-中东欧卷》，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丁超教授与上海外国语大学宋炳辉教授合作撰写，是国内外第一部系统梳理研究中国与中东欧16个国家文化与文学交流的通史性著作。为听取各方面专家学者的意见，进一步深化相关问题的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与山东教育出版社于2016年12月28日在北外联合举办出版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诗人吉狄马加，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作家出版社社长、文学评论家

吴义勤，外交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事务特别代表霍玉珍大使，中联部六局副局长严宇清，教育部国际司调研员王道余，文化部外联局副局长关昕，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彭龙教授、副校长孙有中教授，山东教育出版社社长刘东杰、副总编辑祝丽，《中外文学交流史》主编钱林森教授，以及北外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中东欧文学翻译家和学者易丽君、冯志臣、林洪亮、高兴、张振辉、冯植生、陈九瑛、郑恩波等。与会领导和专家学者从不同视角，就中外文学交流史研究的基本问题和当前中外文化交流的现状趋势，围绕《中国-中东欧卷》的撰著出版，发表了许多发自肺腑的感言和富有启示的观点。我们特将其中部分发言内容摘编整理如下，以飨读者，并为今后的相关研究留存参考。

**彭龙（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 今天很有幸把吉狄马加副主席和各位领导、专家学者请来，可谓高朋满座。我借这个机会向丁超老师和宋炳辉老师出版这部《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中东欧卷》表示祝贺。钱先生主编的这套书，北外有很多老师都参加了，包括《中国-阿拉伯卷》和《中国-意大利卷》，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在这里一并表示感谢和祝贺。

历史决定了北外的特别地位，学校应该怎么发展，如何同世界顶级的外国语言文学院校和学科保持深度的合作，是我们这几年努力追求的。北外现在已经开设 84 个语种，到 2020 年差不多达到 100 种，做到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语言全覆盖，完成总书记和国家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在加强国别和区域研究，整合校内外资源等方面也做了许多尝试。作为新的科研机制，成立了王佐良外国文学高等研究院、区域研究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等四大研究院；另外还积极争取国家外专局、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等单位的指导，引进项目等。通过这些来凸显北外的特色和优势，把学校打造成中华文化向外传播的一个重要基地。

**刘东杰（山东教育出版社社长）** 首先感谢诸位领导和专家冒着

严寒出席今天这个非常隆重而且充满暖意的《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中东欧卷》出版发布会。我们社“十一五”规划和国家出版基金支持的《中外文学交流史》丛书由钱林森教授担任总主编，丁超教授和宋炳辉教授担任中东欧卷的主编，应该说从史料到编撰，作者都倾注了大量心血。今年11月16号在罗马尼亚国际书展上，我社与罗马尼亚“欧洲思想”出版社签署了版权输出协议，这不仅对发展中罗友好关系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增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也有着积极的促进和启发意义。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相距遥远，但并不陌生，文学所具有的独特的人文魅力和精神力量，以及我们在座各位所从事的文学与文化交流，让我们彼此相连，紧紧相拥。当前“一带一路”建设和中国中东欧国家“16+1合作”的全面展开，为我们与中欧各国文化深度交流带来了新的机遇。我们相信，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文化交流一定会在无数前人奠定的基础上继续成为关注人类命运、体现人文情怀、观照当下现实的重要方式，在国之交、民相亲、心相通的过程中精彩纷呈，暖意无穷，熠熠生辉。

近年来山东教育出版社牢记肩负的崇高使命和社会责任，围绕国家“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建设的要求，持续挖掘优势资源，为国家战略布局提供历史与建议、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中华文化走出去也在积极地做出努力。今天也有外研社的同行参会，我们也希望向外研社学习，开展合作，为中华文化走出去，为专家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传承下去共同努力。

钱林森（南京大学教授、《中外文学交流史》主编）参加今天的座谈会内心很不平静。我1963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后来根据外交部长陈毅的指示，为开展国家对外文化交流，在北外对外师资班又学习了三年法语，所以北外也是我的母校，重返母校非常兴奋。回想这套丛书的策划编写出版过程，那还是2004年，山东教育出版社的祝丽编辑，她是丛书的总策划，也是我们比较文学圈内的学者，带着

她的先生和女儿到我家，谈到想搞一套中外文学交流史。那个时候我已经退休了。大家谈到中国的比较文学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都感到应该有一个系统的总结。开始只是考虑把成熟的内容搞成八卷，后来编委会开会的时候，可能是头脑发热，列出了庞大的19卷，现在完成了17卷。我记得，2006年还申请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那时的资助力度大约是9万元，到手才6万元，当时不少了，不像现在。我们有个不成文的约定，经费使用只限于各分卷主笔或分卷主编退休教授。课题组中年纪最长的是李明滨先生，年已八旬。

最初考虑东欧卷的时候，从《中华读书报》上看到了丁超的文章，得知他已经开展了中罗文学关系史的研究。我和祝丽找到他，一见如故。宋炳辉是中文系的，是从比较文学视角研究东欧文学的专家。他们分别来自北外和上外，一北一南，从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两个学科携手互补，加上北外东欧语言专业的资源和团队，搭建了理想的作者阵容。现在完成的这一卷成为压轴大卷，并且是根据我当初的设想，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外文学交流的通史，令人感到兴奋。

在这里，我要首先感谢山东教育出版社，正是他们的高远眼光和鼎力支持，促成了今天的这17卷的出版，并且到目前已获得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实现了6种版权输出。我们比较文学界的领军学者乐黛云先生也非常高兴，她委托我们向大家表示衷心的祝贺和感谢。

第二，我要感谢我们这个团队。从最年长的80多岁的李明滨先生，到现在的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包括北外张西平教授。他当时接替病中的吕同六先生主持《中国-意大利卷》，临危受命，与马西尼教授共同带领团队完成了任务。十年磨一剑，正是我们诸位同仁，我们这个团队的奋战状态和成就。

我还要感谢曾经与我们携手奋斗、不幸过早离世的吕同六先生，还有《韩朝卷》的韩振乾先生、刘顺利先生，我们很怀念他们，今天这17卷书也是祭奠他们的一束鲜花。令人欣慰的是，这套17卷著作也可视为我们比较文学界为“一带一路”建设贡献的第一块砖石。

吉狄马加（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诗人、文化学者）今天确实非常高兴来参加这样一个座谈会。《中外文学交流史》17卷正式出版，是我们中外文学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可以说也是中国文学界、翻译界的大事。今天又在我们培养外国文学人才、开展对外文化交流的崇高殿堂北京外国语大学召开《中国-中东欧卷》的座谈会，本身也说明了这套书的特殊意义。特别感动的是，今天在这里可以看到很多，尤其是东欧文学方面的翻译专家，包括易丽君教授、林洪亮先生、郑恩波先生，还有张振辉先生等，我们早就阅读过大家翻译的中东欧文学作品。作为中国作家、中国诗人，其实我们都受惠于中东欧文学，有大量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对不同历史时期的作家产生了深刻影响。所以我想代表作家协会，向我们今天研讨会的主办方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山东教育出版社表示感谢，同时也要向多年来致力于中东欧文学翻译研究并做出重要贡献的翻译家、学者和教授致敬。

刚才钱林森教授已经谈了，主编这么一套书不容易。在整个中国对外文化交流过程中，有很长一段时间，从严格意义上说，文学翻译是不太对称的。近十多年来，加大了这方面的工作，现在我们在不断翻译包括中东欧文学作品在内的整个外国文学，同时中国的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很多文学经典，包括一些重要的作家诗人的作品，也被翻译成了外国语，其中也包括中东欧国家的文字。可以看到，整个对外文学交流开始逐步在一种比较对等的关系上进行，呈现出一种文化的相互影响。随着中国国际地位提高，我们的文化和文学话语权不断增大，这种交流呈现出互动对等的很好态势，这是一种突破，它离不开我们很多相关机构包括很多专家做的大量工作。这套书的出版，一定会对中外文学交流发挥很好的促进作用。

第二，我想讲一下，中东欧文学的翻译研究在中国的历史上应该说是传统的。特别是“五四”以来，尤其是从鲁迅先生、茅盾先生开始，就非常关注对中东欧文学的翻译，因为鲁迅先生当时谈到“弱小民族文学”的翻译。这是一种自发的行为，因为当时中国也处在半

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我们中华民族也备受列强的欺凌。实际上中东欧民族的生存状态也是类似，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处在大国挤压当中，只能通过文学来保留他们的文字，通过文学精神表达他们的民族存在。

“五四”时期，翻译中东欧文学带有一种很强的启蒙色彩，通过翻译唤起国人的爱国主义情怀，包括对我们自身历史文化的认知。鲁迅先生不单纯从一般意义介绍文学，他是想通过介绍当时这样一些处于弱势的民族国家文学，来唤起我们中华民族的崛起。所以说，他们翻译文学的作用是非常强大的。

到了50年代，有一大批翻译家也翻译了很多很好的中东欧文学作品。那个时候在整个的东方阵营，让我们与中东欧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学有了一种天然的深刻的联系，有一大批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在促进50年代的中国作家写作过程中起到了借鉴，对比较文学的形成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我曾经与邓友梅、刘绍棠等先生交流，他们都谈到了俄苏文学、东欧文学对他们的影响。所以说，50年代那一代中国作家诗人，他们的写作毫无例外地受到了东欧文学的深刻影响，具体表现在这些作家作品的特质和个性，以及文学的开放性，实际上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在更大的文化范畴学习借鉴。因此，这样一些文学，包括反法西斯战争的文学，对我们中国作家也有很深刻的影响。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国家加强了对外开放，一大批中东欧文学被翻译到中国，出现了百花争艳的状态。我对80年代以后译介的中东欧作家作品印象比较深，包括波兰的莱蒙特、米沃什等一批重要作家诗人的作品，还有后来译介的辛姆波尔斯卡、赫贝特等，波兰文学在一个阶段形成了对中国当代作家的影响。捷克也是这样，近十五年来，像米兰·昆德拉、赫拉巴尔、塞弗尔特等作家，他们作品的中文译本数量非常之大。还有阿尔巴尼亚的卡达莱，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匈牙利，波罗的海三国的文学，近年来也介绍了不少。这些作家和作品近十年来对中国当代作家的小说、诗歌创作的影响，可

能比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更直接，甚至比英美文学影响更大。

我们对翻译家充满着一种敬意。其实文学的交流如同种族的交流一样，一种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挤压，会让后者缺少更大的生存空间，但是任何一种大的文化如果全封闭起来，这种文化也会僵死。任何一种文化只有在交流过程中，从异质文化获得活力后，才会变得越来越强大。当然，中华文化本身是具有很强的包容性的。客观来说，中国作家现在的阅读也不同以前，是一种开放性的阅读，所受文学的影响也是开放性的。中国当下的文学创作，包括现在作家的写作，包括写作的方式，包括语言实践，包括在形式上和创造上的很多新的东西，实际上也是受惠于除我们自身文学传统之外的外来文学，尤其受到翻译文学的影响。

前两天我刚刚和高兴先生一起去了成都，参加罗马尼亚作家乌里卡鲁的长篇小说《乌村幻影》首发式，他现在是罗马尼亚版权协会主席，过去长时间担任罗马尼亚作协主席。通过他的小说推广有一个感觉，就是文学交流一方面要把我们的文学作品到中东欧国家进行出版推广，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把他们的一些最好的，一些经典的，不管是古典的还是现当代文学，翻译成中文，实际上这样的文学交流才会进入一个深层次的、有深度的交流，而这种文字的交流，文学的交流，精神的交流，更容易拉近国家和民族之间心灵和心理的距离。所以我想，这方面外国语大学确实是承担很重要的任务，包括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解体之后我去过一趟那里，见到苏联科学院的人，包括文学翻译家，他们跟我说，你们一定要注意，苏联解体之后最大的损失就是外国文学翻译的人才和机构。苏联时期研究的语种，翻译各国文学和哲学，包括思想史研究方面，超过美国也超过整个西方。苏联最多的时候有160多种语言能力，他们可以在第一时间把全世界最好的文学作品翻译成俄语，这是很了不起的。但是，研究人才和机构没有人去管，瞬间就流失了，就分崩离析了，损失巨大。

现在习总书记提出要增强四个自信，对文化自信是总书记反复强

调的。我们中国正在从一个文化大国向文化强国迈进，我想大国和强国还是有区别的，强国就是你真正要有这样的文化软实力，而你的文化确实在各个层面真正要深入到一种国家的主流文化当中，才可能称得上是一个强国。我觉得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文学交流的作用是越来越大了，我们现在国际文学交流已经到了深层次交流的阶段，而不是一般性的交流。所以我想《中外文学交流史》的出版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也希望我们下一步交流过程当中，能够更多发挥翻译人才和翻译家的作用，使我们对外文学交流，包括我们今后的中国和中东欧文学交流有一个更深入、更高水平的发展。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霍玉珍（外交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事务特别代表，中国前驻捷克大使、驻罗马尼亚大使） 文学交流也是外交的延续，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特别高兴出席今天的《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中东欧卷》出版座谈活动。我们要感谢作者，北外丁超和上外宋炳辉两位老师的合作我也很欣赏，优势互补，非常有意义。他们的成果我认真拜读了，受益匪浅。应该说，这部书的材料是扎实的，根据是可靠的，论证是有依据的。这是一个重大的贡献，填补了我们与中东欧合作过程中在文学方面的空白，不仅仅是对我们中国的专家学者是一个依据，也可以供对方搞研究的时候参考，对于普通读者了解中东欧及其文学也很有意义。听说这套书已经有几个版权输出，包括罗马尼亚语版，我想还可以通过使馆、通过我们的外交官做一些努力，让这套书走出去，让中东欧16个国家更多的民众从中了解我们的文学界是如何交流的，不光知道我们的孔子和《红楼梦》，还要看到我们当代中国的面貌。今年是“中国-中东欧国家人文交流年”，这部书是一项宝贵的成果，可以说是“收官之作”。

吴义勤（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作家出版社社长、文学评论家） 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能够出版为学术做贡献、做积累的这样一套书，确实是难能可贵的。这个时代可能比较浮躁，但是还是有很多学者埋头做这样学问积累的工作。刚刚听到钱老师讲的编撰过程，我非常感



动，6万块钱就做这么大的项目！现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都是80万到100万，但是有的时候做出来的成果没有这么厚重，质量没有这么高。现在可能我们各个方面钱都很重要，但是要把钱转化为货真价实的学术成果，这对我们中国学术界是一个考验。这套学术书出得非常漂亮，这就是对学术的敬意，我们时代对学术应有的态度，体现了学术应具有的荣誉。我要向丁超和炳辉表示祝贺，我们也要向山东教育出版社、向祝丽表示祝贺！

几个月前，祝丽关于这个书给我发了一个短信，说丁超教授有一个设想，准备把我们编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初版本图典》的中东欧文学译著信息作为附录收入，我是同意的，这次没有看到有些遗憾。我很支持附录进去，学术是一个社会公器，各方面都可以共用。我们编那部书主要是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资料，如果附录进去也挺好，可以显示中国现代翻译和出版中东欧文学的目录，有史料价值。

这本书我虽然没有全看完，但已经感到非常有价值。今年6月，第一届“中国-中东欧16国文学论坛”在匈牙利举行，中国作家团是我带队去的，论坛办得非常成功。让人感受到中东欧国家文学界和学术界对中国的认同和热情，因为中东欧文学跟中国的血脉是相通的，其实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有很多文学基因，中东欧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精神基因，这个血脉非常长，从“五四”开通到现在，包括到了90年代之后的昆德拉，其实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而且从中国作家来说，骨子里面对中东欧的精神基因都是很认同的，今天也有仍有很多共同点，所以我想在这种交流确实有很多提升的空间，在今天中国和中东欧大交流背景下，这本书推出来的确非常及时。

我们现在要进行文学交流，要深化交流，其实不是喊口号，而是要具体扎扎实实地工作，因为要深化首先就要知道传统，对整个传统要进行梳理，我觉得这部书就是很好的梳理，让我们知道与中东欧文学交流这么多年我们究竟做了什么，做得怎么样，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来深化。我想它对我们与中东欧文学交流、学术交流起了非常重要的

作用，因此我想再次对我们专家学者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敬意，也向我们出版社表示祝贺。

**易丽君（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波兰文学翻译家）** 这本书我看了非常高兴，我不是作者，但是我参加过第一次讨论，从丁超领衔组建团队写这本书到今天这个讨论会，从最初的讨论到这本书的完成，是巨大的一步，这让我感觉特别的兴奋。这部书内容庞杂，这么多的国家，这么长的历史，从古到今，无所不包，但梳理得有条不紊，非常清晰，这就是学问，文章做到这个水平我觉得是高手，可以说是用了洪荒之力，开一代学术先河。我觉得丁超和宋炳辉同志合作天衣无缝，还有他们背后的那些人，这书上没有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参加了很复杂很烦琐的校对工作，书出到这样是高水平的，校对也非常负责任。这里也有一个文化积淀的问题，说明我们北外欧洲语言文化学院有一定的文化积淀，这部书也体现了这样一种长期深厚的中欧文学关系研究积淀。

**林洪亮（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原东欧文学研究室主任、波兰文学翻译家）** 首先我向丁超和宋炳辉老师表示祝贺，这样的一本书可以出来，60多万字，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它也体现了北外欧洲语言文化学院老师们的共同努力。我们社科院外文所的东欧文学室在20年前就已经消亡了，北外现在成了东欧文学的一个中枢，我们希望这个中心日益繁荣昌盛，能够把东欧文学研究翻译的传统传承下去，发扬光大，担负起组织者和引领者的重任。除了培养一般的语言能力外，还要加强文学人才的培养，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从事东欧文学的研究翻译。

**高兴（《世界文学》主编、东欧文学翻译家）** 我是北外的学子，到北外来参加这么重要的座谈会，看到那么多的前辈老师，非常亲切，也诚惶诚恐。看到《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中东欧卷》，感到惊喜和钦佩。从事中东欧文学译介是非常孤独的事业，我要向所有的老前辈表示敬意，了解中东欧研究和翻译历史的人，都会知道前辈翻译家们

所遇到的无数艰辛和困苦，在各种干扰、各种不正常的境遇中做出成果是相当不容易的。这一卷是很多人想做但不敢做的一件事情，因为这里面意味着太多的艰辛困苦，太多的心血。十年坐冷板凳，拿出这么厚的一部书，是特别让我钦佩的。

我还想在此向各位的前辈表示敬意，我觉得这项孤独的事业有前辈们作为我们的典范，我们内心肯定是会充满独特内在的动力，肯定会不断地继续做下去。刚才很多人说到，现在做东欧文学的后继乏人，但是这种情况最近已经有所改变，这是让我们感到比较高兴的事。比如说，在北外这里有很多年轻的教师，欧洲语言文化学院年轻特别有才华的老师，在他们身上已经看到了巨大的潜力，所以说中东欧文学的翻译研究尽管艰难，但是这项事业还是大有希望，一定能继续发展下去。

**张建华（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俄罗斯文学研究家）** 刚才听大家讲话的同时，我又翻了翻这部书，有三点我比较的震撼。第一点，今天早上不知哪位老先生说到，这套书是“一带一路”文化建设的第一块文化砖石，不仅如此，我觉得具体到我们面前的这部书，它还是一部具有文化史品格的著作，因为它已经超出了我们传统文化交流的理念，涉及历史、传媒、艺术和多种文化形态，其意义不仅仅在文学本体，而且也涉及创作文学本体之外的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的整个文化交流，对我们日后的研究都有了非常重大的意义和作用。第二点，书的理念非常的好，第23页有一句话我是非常认同的，就是说我们写文学交流史的目的不是为了简单的交流，书中提出，核心是要展示不同民族之间拥有的精神共性，我非常喜欢这个提法，而且最终目的是要建构一个心灵相通和谐共生的世界，我对这个理念是非常赞同的。一个文化交流史的作者只有站在这个理念上，才可以有世界的格局，不仅对我们的中国读者有提升，在我们的世界层面也有提升。这是钱先生主张的撰著思想理念，我是非常赞赏的。第三点，我觉得导言部分非常好，关于这本书的中东欧的理念，文学的一些思想、方式方法、

视野立场等，都做了详尽的学术性论证，对我们不从事中东欧文学研究的人有一个引导的作用，提供了非常好的入门东西。

刚才吉狄马加主席也谈到了这一个观点，从20世纪初的周氏兄弟开始，中国文学界就对波兰文学和匈牙利文学进行了介绍，“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一大批作家，茅盾、巴金、林语堂，等等，对外国文学的译介都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2012广东花城出版社出版了“蓝色东欧”系列，做得非常好。中东欧文学和俄罗斯文学有很多相似地方，作为弱小民族的文学，它的历史记忆，它的启蒙，同中国情况是很相似的。

既然是第一块文化砖石，那么中国和中东欧文化的交流需要更多的砖石才可以形成一条路，才可以实现和谐共生的目的。我希望欧洲语言文化学院在这个领域做出更多的成就，并且能够在全国把这个领域做得更好。这本书是北南合作、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学者合作的成功范例。学术的发展，学科的进步，不仅需要高地还需要有高峰，我想这本书就是中东欧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的一个高峰，我希望我们北外有更多的高地，出现更多的高峰。

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